

贵州高原明珠“花溪” 的社会历史变迁

翁家烈¹

【摘要】有贵州高原明珠之誉的“花溪”公园，脱胎于古老濮人族群后裔仡佬族中花佬支系所建的古老村落——花佬大寨。为定番(惠水)粮食供输省城贵阳必经通道，水东土司特建“济番桥”于上。徐霞客旅游贵州时曾于桥头午餐。明清时期花佬大寨牛马市场名闻遐迩。周氏乡绅始行培植景观，抗战期间形成公园。国内名流游览者众，感赞者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来黔视察、览游其间时留下生动记录、赞美诗句。改革开放以来，景区在不断拓展与提升中。

【关键词】贵州 花溪 社会历史变迁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44(2019)05-0001-017

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记录和记忆。前者指业已物化的文物、文献等，后者为流传于民间的传说、记忆与技艺的活态传承。自古以来，中外的许多国家都重视历史的记录与研究，编写出十分丰富、珍贵而宏伟的巨著，让人们能知晓往昔、明白当今、展望未来，但多限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层面。于社会层面的记录与研究却较为简缺，有的甚至于被忽略而未予记录。导致人们对今昔社会的诸多事象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其现实而不知其历史。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我国已从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结构最完整、稳定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型为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城镇化率已达 50%以上，社会产业构成由原来农业、工业、社会服务业转换为工业、服务业、农业的排序。两亿左右的农民长年在东南沿海及发达地区的城市打工，既促进了城市工业、社会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客观上也有助于家乡农村的减贫、脱贫。以村落为单元的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空前规模剧变。《光明日报》2015 年 11 月 19 日载，2002-2012 年，我国自然村落由 363 万个减为 272 万个。十年间，近 91 万个村落业已消失。

无论是传统村落或民族村落都是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信息源”，都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地记录着所在时空内特有的社会历史记忆。至今仍存的村落，无不在社会发展中发展，大多已不是旧模样。无论其生产、生活、思想情操均发生着不同形式、不同内容、不同程度的变化、发展。对业已消失的村落历史文化应力所能及予以追记，对现今仍存的村落历史文化及现状更当抓紧调研与记录，作为我国社会史研究、编写不可或缺的数据储存。此方面已有若干的村志、乡志的编写与出版，但仍然不够。本文拟就贵州高原明珠誉赞的“花溪”社会历史文化之发展与变迁试作如下探索。

一、“花溪”的由来

游走祖国大江南北十余万里的明代旅行家、地质学家徐霞客，在其 60 余万字的名著《徐霞客游记》，记述其于崇祯十一年(公元 1638 年)三月二十七日自广西南丹进入贵州独山州城后，相继经都匀、新添、龙里，于四月十一日至“贵州”。其所指“贵州”，当是明代的贵州省会贵阳，而非省域概念之贵州。元代分全国为 11 行中书省，省下设路、府、州、县四级管理。州设知州理州事。

作者简介：翁家烈，贵阳人，贵州民族研究院研究员、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贵州贵阳 550025)。

《元史·地理六》载，“贵州，下……领郁林县。大德九年，省县，止行州事……贵州地接八番，与播州相去二百余里，乃湖广、四川、云南喉衿之地。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云南行省右丞刘深征八百媳妇至贵州科夫，致宋隆济等合诸蛮为乱，水东、水西、罗鬼诸蛮皆叛，刘深伏诛”。《新元史·本纪第十四》载，“(大德五年六月)壬辰，宋隆济寇贵州，知州张怀德战败，死之”。《守山阁丛书·招捕总录》载，大德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宋隆济“劫顺元母告之地官牧拟进御马，寻攻贵州，杀散普定、龙里守仓军，烧官粮，杀张知州”。

以上诸籍记载的“贵州”所指并非行省级的贵州，而是州县级的贵州。其时的“贵州”已有州城，因系顺元路治所在地，故名“顺元城”，系土城一座。明初水西、水东宣慰司署并置于城内，“改土城为石城”^①。徐霞客在当时的省会贵州即后之贵阳停留三日，于四月十三日早餐后“遂出司南门。度西溪桥，西南向行五里，有溪自西谷来，东注入南大溪。有石梁跨其上，曰太子桥。此桥谓因建文帝得名。然何以太子云也？桥下水涌流两崖石间，冲突甚急，南来大溪所不及也。……又南行峡间二里，历东山之咀曰岷堰塘……又三里，曰大水沟，有一二家在路侧，前有树可憩焉……稍折而东，则大溪自西南峡中来，至此东转抵东峰下乃折而北去。有九巩巨石梁南北架溪上，是为华伥佬桥。乃饭于桥南铺肆中”。

《徐霞客游记·黔游日记一》逐一记述其半日内自贵阳城西行至华伥佬桥沿途的里程、地名、地势及山水走向。所记司南门、太子桥、岷堰塘、大水沟等地名至今仍沿用。所记之“华伥佬”即指“花伥佬”，“花”“华”两者音意皆通。伥佬族乃两晋南北朝时期红水河以北的“僚”人衍化而成西南地区的一个民族族称，与“僰人”“夷子”“徕子”等为同一族类，均为先秦及秦汉时期濮人族系遗裔。

他们长时期、大范围地与彝族及其先民错杂而居，彝族及其先民深知他们的族属渊源，故均将其统称为“濮”。明清时期的伥佬族形成诸多支系，如明《弘治图经新志》卷之一的“红伥佬”男子旧不着冠，今渐作汉人之服饰……妇人以毛布染红作裙，无襞积，谓之桶裙”。花伥佬“俗同红伥佬，但裙用五色，故云花伥佬”。《黔南职方纪略》载贵州伥佬族有披袍伥佬、打牙伥佬、打铁伥佬、青伥佬、红伥佬等支系。

徐霞客所记之“花伥佬河”系俗称，即民间称谓，官称为“济番河”。河上之“华伥佬桥”，官名“济番桥”，嘉靖《贵州图经新志》卷之三载，“在治城西南二十五里花伥佬河。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宣慰使宋昂建”。宋昂“好学工文，服勤持俭，爱民礼士，惟曰不足。苗民有弄兵者，昂必自咎。于政不加诛责，以故政治旁洽，边部辑和。又多收致经史以崇文教，时人称其循良如文翁焉”。

唐宋之际的贵阳既无村落，更无城镇，而是北高南低有黑羊出没的一片箐林之地，俗称“黑羊箐”。自川南经黔西北迁来的部分苗族披荆斩棘入住其间，取名“格洛格桑”。康熙《贵州通志》载，黑羊箐今呼黑羊井。唐末宋初，宋罗二氏互争，呼矩州为“黑羊箐”。道光《贵阳府志》亦载，“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宋景阳逐乌蛮于黑羊箐”。宣统《贵州全省地图说·贵阳府总图说》载，“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矩州于黑羊箐，在今贵州省城”。

苗族在“宋罗二氏互争”间，首领“亚宜”(或称“亚努”“杨路”)遭袭杀而向周边散逃后，仍于每年首领“四月八”殉难日汇集于遇难地“嘉西坝”(今贵阳喷水池)一带默悼，直至20世纪80年代。成为全国各省(市、区)首府罕见之民族传统盛典。明初，地域相邻的水西、水东土司皆名贵州宣慰司，其衙署并置于元之顺元城内。即《明史》卷四十六载，“安氏世居水西，管苗民四十八寨，宋氏世居贵州城侧，管水东、贵竹等十长官司，皆设治所于城内……而安氏掌印，非有公事，不得擅还水西。听暂还水西，以印授宣慰宋然代理”。花伥佬属贵竹长官司辖区。而流经花伥佬段的济番河俗名“花伥佬河”。

《黔南识略》卷一载，“会城(贵阳)五方杂处，江右、楚南之人为多……会城食米全赖定番、广顺。若米数日不至，价则陡昂”。定番即今之惠水。惠水是万亩以上连片的大平坝，为贵州著名产米区，系贵阳食米的主要供给地。花伥佬则是定番米粮运至贵阳的必经通道，故“宣慰使宋仰垒石桥”，即《徐霞客游记》所载“有九巩巨石梁，南北架溪上，是为华伥佬桥”。

《万历贵州通志》卷三载，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巡抚杜拯、巡按王时举题，将程番府移治省城，益以贵竹、平伐二司，改名贵阳府”，作为贵州省会的“贵阳”遂进入史册。1914年1月，遵改府为县通令改为贵阳县，1941年7月1日改建为贵阳市。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废贵州、贵前二卫置贵筑县。贵阳设市后，其县治移于花溪。明设“花仡佬哨”，清为“花仡佬铺”，1912年-1949年10月1日前为“花阁老镇”，其地域名称早于贵阳，且长期未予变更。

20世纪80年代据陆少初老人说，核桃湾(俗名小寨)的杨氏家族请一姓周的先生给族中子弟教私塾，周先生认真、勤奋颇受族人赞赏。某年过节时，该先生竟潸然落泪。问之则言：“独自一人长于此教书，将来死后连簸箕大的地方都没有一块!”杨氏族长听后，深表同情，表示可给其地一块安家。散学后，他带狗一只到寨脚刺蓬里蹲想一会后回寨内歇息，狗未跟回，却未引起注意。数日后，他前往寻找，见狗竟在那里守护着所下的一窠狗崽。遂欣喜地认定那是块好地，即向杨氏族长要此荒地安家。后子孙繁衍，遂取名为伯杨寨。其后裔周奎于乾隆丁未(公元1787年)暮春所撰《麟山记》谓，“吾家祖居伯杨寨。

寨东半里许有山如狮状，旧传为狮子山……兹山头角触天，几于百仞，峻峭削，见日增光。麟兮麟兮，夫复何疑……遂改其号曰麟山……其下有溪水出，亦改号麟溪，并取伯阳寨而更之曰麟阳寨”(见《贵阳府志·余篇》卷之九)。文献记载则与此传说有异。《贵阳府志》卷七十七载，周奎的先祖于明朝初年曾世职毕节卫指挥。其七世祖周永兴曾任川北道金事，晚年迁居贵筑县南乡捕属里麟阳寨。周奎十四岁时父逝，带着一弟两妹砍柴、割麦为母分忧，“虽经日不食，读不辍”，于乾隆庚子(公元1780年)中举后“教授于乡党”。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任开泰县(今锦屏县)教谕，又署麻哈州(今麻江县)训导。

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以老辞归”，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卒。其子周际华嘉庆举人、进士，遵义府教授、道光六年河南省辉县知县。县境累受水患。际华出俸钱，率民醵资，“浚峪河而深之”，疏新河“而坚筑其岸”，“又劝民种桑四万，他树十五万株”，“又为之兴学，此货购房舍……起义学十余，分教乡民之秀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调署陕州知州，十七年补兴化知县。“辉及兴化皆不习织，际华出资立局，置机床二、纺车三十，招织媪教之。令民间女十岁以上愿学者，授以木棉而供其饮食三十人，朝入夕出。能者令归教于家，后来者复补其缺。于是二县之民更相传习。木棉之利大兴，民无寒者”。

二十一年调江都兼授泰州知州。都江沿江，居民连年被水，“际华请于总督裕谦得粟九万以贍饥民”，使沿江数十万口得以生活。辉县民俗好焚香祈祷，聚人至千百。际华再三申谕，前后毁淫祠百余区，卒碎其像，就其祠屋改为义塾。僧有为奸者，辄没入其寺田以为义学用”。同年，其子周頊以给事中出任常镇通海道不久，则以年老痼疾而引归。著有《省心录》《共城从政录》《海陵从政录》《家荫堂诗稿》等，民间传说与文献记载丰简悬殊。然其家贫、执教乡里则系同一，发迹后保持对乡土的热爱并致力于美化开发，实属难能可贵!嗣又与其子周际华于花仡佬河北岸的龟山上栽植柏树，于蛇山上建一楼一底两层皆环以回廊的楼阁一座以培植风景。

1936年冬至1938年秋，福泉布依族人刘剑魂任贵筑县长时，将花仡佬桥之桥头堡更名为朝阳村，伯阳寨更名为吉林村，麻窝寨更名为碧云窝，圉寨更名为西宁村，花仡佬大寨更名为杏花村，并采纳县办公室主任罗浮仙建议将这一总名“花仡佬”的地域更名为“花溪”。刘剑魂在其《花溪杂咏四首·序》曰：“花溪之经营始于民国廿五年冬，欲引城市士女到农村知稼穡之艰难耳。山水清丽，固可一涤胸襟。此大自然之怀抱中，诚如欧阳醉翁所云，‘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乐云乎哉?有无穷之感耳。”作为名胜之“花溪”则从此流传于贵阳、贵州、全国以致国门之外。反对内战、力主抗日、长期从事金融、实业建设、任过实业部长的吴鼎昌，1937年底由行政院任命为贵州省主席。

1939年倡议成立公园建设委员会，于花溪增修放鹤洲、花溪小憩、坝上桥，并购置游船，改八角亭为旗亭。花溪公园虽曾改为他名，然所改之名仅存于档，未为社会、人们所采用，花溪公园之名则从此广泛传晓于路障及全国的文化名人。吴本人于政务繁忙的星期日，总携其妻及女儿、女婿、外孙等家人前往花溪碧云窝岩头别墅休闲，吟咏出“花溪山水胜前溪，准拟移家老圃畦。忽闻使君身是客，鸟声人语惜栖栖”之类对花溪眷恋与赞美的诗句。吴虽出身于四川华阳县，但祖籍乃浙江吴兴前溪。好作诗，取笔名“前溪”。他将入黔赴任之心情、想法、处事准则及上任后的施政方针等汇编成册，名之为《花溪闲笔》刊印

发行。

抗日战争暴发后，国土大量沦丧，国民政府被迫自南京迁都重庆，西南成为抗战大后方。“跬步皆山”却与“滇缅公路”相连接的贵州成为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学校、机关、工厂、民众避难、迁徙重要之地。据张肖梅的《贵州经济》第一章记载，“抗战军兴，外省企业家入黔者颇多，皆有投资办企业之意”。“抗战以后，东南人士多向西南迁移，尤以来黔者日多一日。其中不乏各种专家及拥有大量资财者。如此人力物力空前之转移”。

1950 年底贵州省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编印的《贵州财经资料汇编》载，“直到 1938 年-1939 年间，沿海各地被日寇侵袭，机关学校及部分外埠厂商纷纷内迁，人口骤增，交通发展，贵州的工业因此应运而生”。“抗战军兴，重心西移后，战区撤退之公私机关与生产设备纷纷向本省集中，海外资金大量流入，当时贵阳市人口由 10 万不足之数，转瞬即激增到 30 万”。转移到贵阳的清华大学校友于 1938 年在花溪大将山下创办贵阳私立清华中学，有 8 个班级，以足球队著名。1940 年于花溪建公立贵州农工学院，两年后，发展为贵州大学。

1938 年底，国民政府直辖防空学校经广西宜山迁贵阳，其兴测部队分驻花溪大寨吉林村地。1940 年 7 月 9 日上午 8 时，9 架飞机来炸花溪镇，分校驻军奋勇还击，使其所投炸弹均落于西郊荒山之上，花溪未受损失。防空学校在 1947 年迁回南京后，将 300 余具死难将士遗骸安葬于大寨抗日将士墓园内，并于园内建造抗日将士纪念馆。^①1944 年-1945 年，美国空军后勤部队、陆军作战部队及驻美国军 13 军顾问团等数百人，进驻花溪、青岩等处，先借住清华中学，后曾拨款于今溪北路之蟠龙山下修建俱乐部、后方医院。

1945 年 4 月 8 日，美军卢·格里斯特于游览花溪公园当夜给其妻子洛幕的家书中写道：“今天下午，我们去游览中国风景名胜之一的花溪公园。河岸边生长着茂密的树木，枝叶低垂在缓缓流动的河水之上，觅食的小鱼不时在水面上翻出几朵水花。在一个小山丘后面，我们看到一个老磨房。我们必须经过一条石板路才能走近它。它的右边有一水车，带动石磨围着碾槽转，碾面的人不停地把溅出的麦粒重新扫进槽中，一点都不浪费。这是原始的磨面方法，但效果很好。我们在公园里遇到一些友好的中国军官，他们想请我们今晚去‘干杯’，喝酒。我们对‘干杯’倒竖拇指，表示同意去吃饭……我们去了一家广东餐馆，菜式与云南菜大不相同。从众多丰盛的菜肴中，我只能认出炒面和芙蓉蛋……中国人不仅对我们十分友好，而且也非常愿意帮忙。”^②抗战期间，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文化名流往返于川黔道上者众。其中有的曾到花溪游览，留下美好的记忆或抒发于笔端。1942 年春，作家巴金曾于花溪游住 6 日。

1944 年与恋人肖珊复来此花溪小憩结婚。将肖送走后，于贵阳医治鼻炎，期间写就长篇小说《第四病室》。教育家叶圣陶 1942 年 5 月 23 日、5 月 24 日日记中分别记载：“花溪……四望山色颇佳。贵州之山草多而树少，而此处则有丛生高树者。山国之中，平原旷畅，大于贵阳市数倍……溪有自石堰数道，水面均相差五六尺，冲激下游，遂成瀑布，飞雪泻玉，轰雷喧鼓，颇为壮观。小山之上，新建筑杂立，茅亭精舍，或合式，马路曲折回环，随处可通。野花之香时时拂鼻，不知其名。野蔷薇方盛开。

自入贵州境即见野蔷薇，朵大，烂漫于山脚或路旁。在成都已开过一月矣。”次日复记道：“重缓溪而行，朝阳照瀑流，益见明莹。观人在溪边网鱼，网中已得四五尾，皆尺许。游行两小时返集市。闻今日为牛场，是所谓‘大场’，赶场者将甚众……丑日之场为牛场，午日之场为马场……而花溪复有马场，则为小场，来集者较少。吃茶坐一时许。雇得一马车，价六十元，此种马车形式简陋，连马夫载六人。贵阳至花溪间一趟例为每客十元，则今日星期，游花溪者众，遂破例涨价……车以十二时开，沿路见苗人中所谓‘仲家’之男女甚众，皆来赶场者。”于花溪景色及其特征作出全面而细致、准确描述。

同年十月，因香港沦陷而撤回内地的著名漫画家叶浅予于筑城举办揭露日寇罪行、颂扬我军将士英勇抗倭的画展后，特去花溪观看少数民族赶场后颇有感触地说：“发现苗族妇女打扮非常漂亮。每逢赶集，人人都把漂亮的衣冠首饰穿戴上，集场上五彩缤纷，正如百花争艳，任何画家见了都会动心……从那时起，决心从漫画式的夸张手法中解脱出来，另找塑造人物形象的新

手法。找来找去，觉得应该下苦功向国画传统中的先辈们学习，于是我从漫画创作转到国画创作方面来了。”^①

吴鼎昌主黔，时值我国艰苦抗战时期，在时局动荡、政务繁忙之际，除关注发展中小学教育、民众教育之外，还创办高等教育。1940年1月，于花溪建立公立贵州农工学院，招收农林、农业、化学、农业经济、土木工程、矿冶工程、机电工程等6个系，于1941年底开学。1942年8月，贵州大学成立，除农工学院外，还设文科研究院。至1948年，有教师239人，学生1156人，有丁道衡、乐森瑛、张永立、罗登义、蹇先艾、田君亮等著名专家教授。贵大之建于花溪独具的自然景观之外，还增添诸多人文景观与文化内涵。

二、花溪民族成份之变迁

《贵阳府志》卷八十八谓，“贵阳苗种，《黔书》所记有十三种……《通志》所记有二十种……道光时巡抚嵩溥清查苗人，八番、土人诸种或绝，或割属他境，或变汉俗。所有苗人止十六种”，原因是“或绝，或割属他境，或变汉俗”。其中“仡佬有花、红二种。在府属者居白纳正副二司骑龙、甲斗诸寨”，而明代徐霞客所记“济番桥”亦名“花仡佬桥”地名犹存，族人却未见。是“或绝，或割属他境，或变汉俗”？其实都不是。

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到当时的花溪公社作实地调查，从走访当地领导和干部、群众中得知：花溪公园周边的村寨分别为“大寨”即“花大寨”、杏花村；桥头铺即朝阳村，苗族居住；白杨寨即吉林村，村民为汉族、布依族；麻窝寨即碧云窝，村民为布依族；韦寨即西林村，村民为布依族、汉族；石头村即区委所在地，居民为布依族。全公社22800人口中，苗族占10%，其余为汉族。大寨赶马场，5天一场；街上赶牛场，12天一场。布依族自称“布依”，称苗族为“布尤”，称仡佬族为“布戎”，称汉族为“布沙”。

区政府与大寨之间原有一条河沟，后为泥沙堵塞，地名“打哥”，意即河蹬，宽约2米余。原住区政府这边的布依寨与住大寨的仡佬寨隔着此污塞的河沟为邻。某日，两寨寨老相遇闲谈。布依寨老提出“斗智”游戏的建议，并约定输方须举寨迁离。结果大寨寨老输后，依诺迁走。先立寨于“鬼头坝”，见母鸡常去坝外筑窝下蛋，认为是好地方才迁过来的，就是后来的大狗场。定居于安平县（今平坝县）之大狗场，赢方则移居大寨。其事发生于乾隆年间。花仡佬大寨的原住民既已变更，巡抚嵩溥于道光年间清查“苗人”（泛指少数民族）时，得出“仡佬有花红二种。在府属者居白纳正副二司骑龙、甲斗诸寨”的结论。

布依族人移住大寨，有斑、罗、龙、王、韦诸姓，分住上、下、中、里头、新院等5院。他们对仡佬族留于寨内的坟墓（石棺葬，布依语叫“摸戎”）世代尊重，予以存留田土中，未见损坏或迁移。平坝县的仡佬族，主要聚居于大狗场。清朝上粮到镇宁，民国改到平坝，由寨老代交。交后以余款买盐回来分给各户。1937年霍乱病流行时，238人被夺去生命。

1982年统计，全寨共有452人。其中除43位汉族外，25位布依族、10位苗族因联婚关系移入者外，全系仡佬族。其民族语言保持较完整，称汉族为“补梭”、布依族为“补衣”、苗族为“补蚩”，自称“褒佬”，共有王、何、涂、李4姓。有水田730亩、旱地160亩。前者种水稻，后者种苞谷、洋芋。几乎每家都有纺织机，女孩12岁左右即学习织布、绣花。青年男女农闲时或赶场于路边或坡地上对唱情歌（仡佬语叫“歪胜”），情深意笃者可告知父母。父母同意即请媒撮合。虽行姑表亲制，但系单向，即舅家女儿可作姑家媳，姑之女决不能作舅家媳。

依古礼“男不亲迎”，新娘在迎亲队伍接至婆家门前时，新郎及其全家均须回避，等新娘入堂拜祖后，方与公婆、新郎见面。老人病故，须由孝子扶坐凳上落气，尸体倒停于堂屋中，即民间所谓“横夷倒仡佬”。古代行石棺葬。农历七月逢龙为吃新节。

该日清晨，全寨男女盛装集于寨中一株大树下听候寨老安排活动：一批青年男女集于村口唱歌、递酒迎接前来参加活动的亲友，以糯米粑祭祖后分给寨民及客人食用；另一批于寨外各丘田地中摘取些许初熟谷穗、瓜豆，回寨祭祖。即使是外村外族所属

田土内作物被摘，从不会遭遇阻碍或斥责，认为如此来年这块田土内的作物才会丰收。各家祭祖后，会于古树下集体祭祖。寨老坐祭桌侧念请祖宗前来享用祭物、祈祷全寨人畜兴旺平安、作物丰收。祭毕，青年男女开展对歌或表演武术。节后，各家开始忙碌准备秋收。

正月逢虎、猴日，开始跳地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寨内专有 6 石谷子的“地戏田”，供寨内外跳地戏时支用。全寨有地戏班子三台，每台有演员及锣鼓手二三十人，剧本取材于《三国演义》《说唐》或《杨家将》等古典小说。演出时，扮演不同角色的演员额戴不同木制脸谱，罩以黑色面纱，背插四杆将帅旗，在锣鼓声中于寨内地坪上用汉语念唱、跳动打斗，其余村民则男女老幼层层围观。

正月十四，寨内地戏关场，所有面具、道具收箱上锁，烧香祭供刘备、关公、张飞等人，祈佑全寨人畜平安、五谷丰登后，抬藏于五显庙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保藏于公房内)。正月十五这天，方圆百里有地戏班的则在本寨内停跳，纷纷会集大狗场会演，有时会多达数千台，热闹非凡。寨内各户则茶水招待各族来宾，但对花溪仡佬大寨来的人则例外，不仅不欢迎，甚至会动手打(据笔者于花溪调查时，大寨龙永芳老人说，我们爱看地戏，但以前不敢去大狗场看。因为他们不欢迎，见着我们大寨去的会动手打，以后才有好转，甚至娶有布依女做媳妇)。

道光年间成书的《贵阳府志》除上述的花仡佬大寨外，还载有诸多以仡佬冠名的地名。如卷二十五载水边里“革老寨，在城东北四十里”。卷二十六载，东下里之大都场有仡佬寨，小都场有仡佬湾，“民九十余户……有水自上塘口来，流入仡佬河”。“仡佬湾在城北七十里……西至仡佬寨”。南下里，“八里屯在城南十二里，北七里至仡佬场”。

捕属里，“花小寨在城南三十里……居民三十余户”。小关寨在城南五里……西至五里仡佬寨”。“仡佬寨在城南七里，其东四里五里桥……居民五十余户”。西上里浑水屯，“在城西十七里……西四里仡佬寨”。“茶园寨北三里仡佬寨”。西隅里茶饭寨，“原名仡佬，俗传因供建文茶饭，今更名”。卷三十三载，“城南之水曰龙潭、四方井、曰花仡佬，中有扶风洲，上有花仡佬”。以仡佬命名的村寨、场坝、河湾等达 10 余处之多。

其中有的不仅古老，且含有故事。贵州民间及文献历史上广传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其嫡长孙朱允炆继位为惠帝，改年号为建文后，即与齐泰、黄子澄等朝臣密谋削诸藩王。燕王朱棣即以“靖难”为名据北平起兵反对，于建文四年(公元 1402 年)攻下都城南京后自立为帝，建文则不知所终，成为一则历史之谜。陈建《皇明通记》卷之三则言“建文帝纵火焚宫，变服遁去”。《徐霞客游记·黔游记》载，其四月十四日经太子桥时，即言“此桥谓因建文君得名”。

次日，登广顺白云寺游览见闻为：“白云寺则建文君所开山也”，“潜龙胜迹阁”祀建文帝遗像，“白云山初名螺拥山，以建文君望白云而登，为开山之祖，遂以白云名之。一统志有螺拥之名，谓山形如螺拥而不载建文遗迹，时犹讳言之也”。其实，早在明英宗时期即有相关传闻。《贵阳府志·余编》卷之二十杂识下载：“世传明建文帝遁迹广顺之白云山罗永庵。去后，金筑安抚司金铺为之肖像，捐庄田六所以供香火。今寺门双杉大可三十围，云帝手植。其流米洞诸说多所不根，唯传建文帝题壁诗三首。”金铺为当朝土司，“茶饭寨”为边远山区仡佬族普通乡民。他们对从权力顶峰跌落流逸的帝王能如此相待，实属稀见罕闻。

《贵阳府志》载贵阳的仡佬族有“花、红二种”，其中“衣红布者曰红仡佬。花布者曰花仡佬”。而以花仡佬居多。《徐霞客游记·黔游记》所载“华仡佬”即花仡佬，嗣迁安平(平坝)大狗场者即其后裔。《旧唐书》列传第一四七载，“东谢蛮，其地在黔州之西数百里，南接守宫僚，西连夷子……婚姻之礼以牛酒为聘。女归夫家，皆母送之。女夫惭，逃避径旬方出”。仡佬族的先民为先秦至两汉时期的“濮”人，“三国”为其由“濮”转称为“僚”(读如“佬”)的转换期，两晋南北朝则由“僚”衍为“葛僚”。

明清时普遍呼写为“仡佬”。与濮接触最早、最为广泛的氐羌系的遗裔彝族，无论其过去与现在，于彝文著作或语言表达

上均将其呼写为“濮”，上引《旧唐书》所载“西连夷子”句中的“夷子”，即“羿子”，实与仡佬为同一族类。主要分布于川南及黔西北一带。“女归夫家，皆母自送之”，指新娘出嫁时不由新郎迎娶。“女夫惭，逃避径旬方出”，是言新娘来到夫家时，新郎及其家人皆须回避一段时日。大狗场仡佬族婚仪虽有所变化，但仍遵行基本古规：男方请父母辈的三男三女作为媒人、证人到女方家与其父母商订婚期后，组成迎亲队伍，抬着礼物前往迎亲。

新娘以红伞遮头随之来到婆家门前停下，待一老人于门内念“回喜神”词语后，新郎及其全家皆回避。新娘将所带盐、茶、五谷等恭敬地放于神龛，跪地面向神龛磕头 3 下——拜祖后，方与公婆、新郎见面。老人病危时，由孝子扶坐凳上落气，尸体倒停于堂屋中。开路时巫师念：“你去了，我来吩咐你和老祖公老祖太、祖公祖太在一起。平坝是我们的，安顺是我们的，贵阳是我们的……鸡往上走，你跟着往上走，鸡往下走，你跟着往下走，不要掉头看凡间，不要来逗狗吠，不要来惹娃娃们哭”。

传说最初他们是先由 3 位祖公来找地方，到了罗鬼坝立寨(与大狗场隔河相对偏西的一里处)，住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寨内一只母鸡于河水干时常去对面大狗场下蛋，认为那是个好地方，就举寨迁往其时一片荒凉的大狗场，将其开为场坝。后来因为赶场时人多事杂难于管理，遂停止集市，由寨老出面商定合并到羊昌河集市去赶场。每年寨内只留出正月十五这天赶一场。名虽为场，但无农副产品交易，亦无摊贩摆设，仅行地戏表演。届时，平坝、安顺、广顺汉族、布依族、仡佬族都有人来大狗场，少则数百，多达数千，十分热闹，被称为娱乐场。寨内各户男女老幼忙着接待亲友、共同围观各台地戏演出，场面十分热闹壮观。平坝大狗场独特的场期、场名从而名闻遐迩。

三、当代“花溪”之发展

日寇投降，举国欢庆。难民各自纷纷回迁故里，机关、学校、工厂多撤返原址。繁华一时的贵阳人口迅即剧减。1947 年 5 月，贵大一学生无端遭保安团士兵殴打，导致 600 名学生高举“抗暴游行”旗帜，从花溪步行进入贵阳城向省政府请愿。迫使时任省政府主席的杨森出面，表示赔礼道歉、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并以车辆送游行学生回花溪返校。国民政府发行金元券、银元券导致货币急剧贬值、物价飞涨、物资严重匮乏、市民生活维艰、高校师生生活难以为继。

1949 年 3 月 20 日，贵大教授会与讲师助教会开会决定罢教。次日各系各年级学生代表举行临时代表大会，选出以史健为首的主席团，率领千名学生于 26 日，高举“反饥饿”的横幅标语步行进贵阳城游行请愿，并散发《贵州大学为抢救师长员工饥饿运动告父老书》。时任贵州省主席的谷正伦允诺“借发一月公粮……各同学食米差额由省府拨动稻谷 1000 石救助”。各宣传小分队则行义卖、募捐，返校后用以慰问学校员工。

1938 年底，国民政府直辖防空学校经广西宜山迁贵阳，其兴测总队分驻花溪大寨、吉林村等地。1940 年 7 月 9 日上午 8 时。9 架飞机来炸花溪镇。防校驻军奋勇还击，使其所投炸弹均落于西郊荒山之上未受损失。防空学校在 1947 年迁回南京前，将 300 余具死难将士遗骸安葬于大寨“抗日将士墓园”内，并于园内建有抗日将士纪念碑。^①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在花溪公园任助理管理员的杨大德介绍，“当时的公园，范围极小，设备亦差，整个公园东起花溪大桥，西至西舍，南北仅有筑于花溪河两岸的路”。“由公园大门沿河而上，经贵筑县政府、花小到麟山……眺望四周层峦叠嶂，俯瞰花溪全景……麟山北麓有水流穿过山底经小沟流入河中……小沟西面有花圃、苗圃和公园管理处房屋……小沟西面还有木船十余条，供人游览。

管理处西面有小桥……桥头有龟山，有木板楼房三间……北山腰有碑亭，内竖石碑三块……刻有花溪公园及缘由的文章……龟山顶上有防空学校修建的防校亭，呈六角形，每根石柱上都刻有抗战时期的标语口号，亭内有石桌石凳。龟山脚草坝中有葡萄架，呈正方形……内置石桌石凳，上攀葡萄藤、葡萄架，西面是坝上桥，桥东面有碾户，内设石碾、石磨及碾米磨面粉的工具……坝上桥除桥墩外，全用树木构成，桥身弯弯曲曲……顺此处石梯上至顶，有茅亭名‘观瀑亭’……西面有尚武俱乐部及西舍房屋……西舍内设茶座及小卖部，另有房间租给贵大教授居住。

门前有荷花池……坝上桥东面有山名‘听涛岭’，山脚有旗亭及房屋，内设茶座及小卖部。旗亭东北有山名柏山……因有柏树如亭……故名‘柏亭’……沿东面石梯，沿石梯下至山腰，有圆桌、石凳。山脚河边有洞，终年出水，洞水河水泾渭分明。柏山除东面外，其余三面都有花圃，东南面还有大草坪。柏山东北麓顺河水设有石跳蹬，连接到芙蓉洲小山包，供人游览河水风光……由旗亭后东走经小桥到花溪小憩。小憩内设旅社……，有客户十余间。从‘花溪小憩’往东，可至花溪大桥。

大桥南面有茶亭及房屋，房屋租给新广州照相馆营业”。“园内山上岩石参差，树木丛杂，树木多从岩石缝长出，姿态雄伟，独具风格。沿河两岸每隔数丈有一长石凳，供游人歇息。河的中段有数十个凸起的小石包，叫放鸽洲。在公园里，春来两岸桃花盛开，冬至山间腊梅独放，多处的流淌都伴山而行，风景各有其特点”。^①经其介绍，游览过的名人所倍加赞美的“花溪”，境域、方位、构成及其特色鲜明而准确地跃然眼前。

1949年11月15日，花溪人民于晴朗的天空下、在鞭炮声中屹立济番桥两侧，热烈迎接解放军的到来。花溪镇原属贵定专区管辖。1954年，贵筑县改为贵阳市辖县，下辖花溪、金华、乌当、中曹4个区。1957年撤销贵筑县、花溪区，将花溪所辖油榨乡、太慈乡划入南明区。1959年花溪区建立花溪、青岩、石板、党武4大公社。

2005年，花溪区撤销花溪镇，改设贵筑、清溪、溪北3个街道办事处及青岩镇、石板镇、党武乡、麦坪乡、久安乡、燕楼乡、湖潮布依族乡、小碧布依族乡、孟关苗族布依族乡、马岭布依族苗族乡、黔陶布依族苗族乡、高坡苗族乡等。随着历史的发展，原来仅只是一个普通村落的花仡佬大寨，渐之发展、衍变为镇、区、公社等稳定的地方行政区划名称，载入史册，尤其是衍生为风景名胜地而蜚声中外。这一细小的历史偶然及其必然性，不惟有趣，还会令人沉思、赞叹。

花溪之名，肇于花仡佬大寨。流经其地之花仡佬河因通定番(今之惠水)而被命名为济番河。水东土司宋昂建桥其上，名为济番桥。徐霞客旅黔曾于其桥头午餐，记其于《徐霞客游记》中。元末农民大起义中，朱元璋推翻元王朝，建都南京，元顺帝败据塞北，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则盘踞云南拒降。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秋，遣征南将军傅友德及蓝玉、沐英等将领率30万大军征云南。

云南平，因其为边陲要地，特于湖广至云南通道所经之贵州境内广设卫所，施行军事管制(其时贵州境内基本无郡县设置，全为大小土司统治)。贵州都指挥使司为贵州最高军事指挥机构。辖有贵州卫、贵州前卫、威清卫、平坝卫、普定卫、安庄卫、安南卫、普安卫、龙里卫、新添卫、平越卫、清平卫、兴隆卫、都匀卫、乌撒卫、毕节卫、赤水卫、永宁卫等34卫。另有镇远、平溪、清浪、偏桥、铜鼓、五开六卫，则隶于湖广都指挥使司。明代的军事制度是寓兵于农的卫所屯田制。卫辖前、后、左、中、右5所，所以下的军事据点称为屯或堡。卫之定额为5600人，通统编入军户世袭。通常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田”。

其兵源主要从民户中抽取。被抽为兵者，须带家眷同行，无配偶者，官府则为之婚配，世代为军户，多为江南或中州籍。众多的卫所广布于贵州的城镇及交通沿线屯戍，以控扼土司。为拓展城乡物资交流而于适中地设置场坝，选十二生肖之一为场名，届时城乡居民定期定点进行集市贸易。“花仡佬大寨”即在此历史背景下成为省会著名的牛马市场。尽管后来场坝由花仡佬大寨移往街上，花仡佬大寨的仡佬族人迁往安平县(平坝县)大狗场而换为相邻的布依族人入住，但其寨名未改，场名、场期依旧。

1954年，贵筑县改为贵阳市辖县，下辖花溪、金华、乌当、中曹4个区。据2004年出版的《花溪布依族苗族乡志》载，花溪大寨村面积为4.84平方公里，全村360户、1392人口中，90%为布依族、汉族人口占10%，为丘陵盆地地貌，平均海拔1100米。森林覆盖率为20%，花溪河(昔称花仡佬河)，流经全村。

1937年改为杏花村，1941年改名为大寨属花溪镇，1953年属吉麟乡，1958年改为大寨生产队，属花溪人民公社。1958年11月2日，时任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来贵州视察，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时任中央候补书记杨尚昆及时任贵州省副省长吴实、时任省军区司令员田维扬等陪同下，下榻时称省属花溪招待所的碧云窝宾馆，访问

花溪人民公社。其时正值全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高潮，花溪区正在开展以深耕为中心的生产突击运动。花溪公社的吉林大队和大寨大队的田坝定为丰产坝，必须深耕，故这片田坝有十几个“深耕野战营”驻扎，到处红旗招展、热火朝天。

正在吉林大队麟山旁田坝里与社员一起深翻土地的花溪公社党委书记，在下午三点多突然听见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喊道：“上级领导来检查生产，请花溪公社张书记立马到碧云窝招待所汇报工作”后，即于田边找双布鞋穿上，向碧云窝奔去。在走到平桥至碧云窝之间时，就见一行人走下来。经时任市委书记伍嘉谟介绍后，小平同志握住张大才手亲切地说：“辛苦了！看看你们的生产情况。”

边谈边向麟山方向看深翻田地情况，并对市、区、公社领导们说：“群众深翻土地干劲大，各级领导要爱惜群众的积极性，要劳逸结合，不能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要注意实效，切实搞好群众生活。”并问时任区委书记齐林阁：“你们去年每人产值是否有160元？群众的房子怎么修？托儿所怎么办？娃娃怎么带？人家不愿入托儿所怎么办？”齐林阁一一回答后，小平同志又问张大才：“你们花溪的米多少钱一斤？菜多少钱一斤？盐巴多少钱一斤？一尺布、一斤肉要多少钱？”大家整天忙于组织领导大炼钢铁、深翻土地，很少回家，又不过问柴米油盐事，答不出来。齐林阁、伍嘉谟也不清楚。还是时任省委书记周林上前解围说：“他们忽视了这个问题，今后要引起注意，这是关系群众生活的大事情。”在折回碧云窝到平桥附近时，小碧公社野战营正在开晚饭。小平同志信步上前揭开蒸盖、锅盖看看，并问民兵们吃得饱不，多久吃一次肉。那天他们正在打牙祭，吃的是萝卜炖肉，小平同志高兴地笑了⁽¹⁾。

1959年，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陈毅元帅，1960年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周恩来、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到花溪游览，住过花溪西舍。他们有的还写下了赞美花溪的诗作。董必武的《花溪》：

偶经贵筑便流连，闻说花溪引兴牵。

市集得交苗僮族，山园正是菊花天。

桥临坝上行观水，亭接岩头欲近仙。

几曲清流徐下注，两旁田稼保丰年。

陈毅的《花溪杂咏》（七首）

真水真山到处是，花溪布局更天然。

十里河滩明如镜，几步花圃几农田。

蛇岭龟山相对峙，麟阁耸立似玉屏。

坝上桥头听风雨，溪边还有夜钓人。

花溪棋亭位山腰，多人到此费推敲。

劝君让他先一着，后发制人棋更高。

韦寨水库已竣工，莲花山峰被削平。

湖水碧绿三十里，夹岸桃花照眼明。

公社农业机械战，十部耕机左右陈。

此是历史新开始，机械已代四体勤。

弟兄民族最相亲，苗汉布依一家人。

公社内外大合作，共同感谢党恩情。

东舍西舍小停留，长看溪水绿如油。

农村如此园林化，神州富裕永不愁。

朱德的《题花溪》：

东风送暖百花开，流淌悠悠曲折回；

公社公园新建好，长征战士赋归来。

西舍位于花溪公园蛇山西麓、坝上桥西。楼前花园内有周恩来总理与邓颖超同志塑像。二楼陈列着周总理当年视察花溪和贵阳的多幅照片。1982年“花溪西舍”评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平桥南连大寨，北接碧云窝，济番河（花仡佬河水）沿花溪大道东行。平桥上游河面宽、水流急，成为天然游泳场。新辟南湖、牡丹园及松柏园三景区，系引花溪河水入池内而成。池内有岛，岛上植有树木，林中建有亭阁。湖面有游船，可荡舟其间。牡丹园、碧桃园介于南湖两侧。前者以牡丹为主，植有芍药、塔松、玉兰、樱花等树。

碧桃园遍植桃树，约达4公顷。2009年底，住建部批准以“十里河滩”为主体的花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正式设立。从花仡佬桥下游沿公路南侧至董家湾河段，夹于村寨、田畴、堰塘、沟渠、草甸，沿花溪大道南侧杂陈。遮风避雨、空气清新、为静坐、休闲、避暑佳境。实乃明媚、秀丽花溪公园的衬托、拓展与延伸。在花溪大道北边，则耸立贵州民族大学及贵州大学与之相对应。

1931年建立的花仡佬小学，起初分为东西两校，分别于花仡佬镇的一座旧庙及柏杨寨周氏宗祠内上课。1937年迁花仡佬大寨，改名花溪表证中心小学。次年，新加坡华侨胡文虎捐款建新校舍于麟山麓，改名花溪中心小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接管更名为花溪小学，但无围墙、无校门，校外人员可随意进出。

区政协对此颇为关心，2001年将《关于建好花溪小学》的督办提案送区政府，引起区政府重视，于麟山西侧拓展1万平方米，有32个教室、多媒体教室、计算机教室、图书室、会议室、小学生科技作品展览室、塑胶学生运动场、风雨操场等一所全市唯一的花园式学校于2005年4月落成^①。1950年建立的贵州民族学院，1951年5月17日于贵阳普陀路程万中学作临时校址举行开学典礼。1953年初迁花溪朝阳村，1959年合并入贵州大学，1973年重建，临时校址在龙洞堡。后于董家堰建新校址。2002年有中文、法律、社会学、民族文化、外语、公共管理、美术、音乐、数学、物理、历史等15个系。

2012年4月更名为贵州民族大学。1953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贵州大学被撤销。仅留其农学院农艺系为基础组建

贵州农学院。1958 年“大跃进”大办高等教育热潮中，办起了贵州大学、贵州工学院和财经学院。1992 年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后，1997 年，将原贵州大学、贵州农学院、贵州艺术高等专科学校、贵州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合组建立新的贵州大学。设有 34 个系、40 个硕士学位授予点、2 个博士点。为了进入“211”，2004 年 3 月，贵州省委决定将贵州大学与贵州工业大学合并重新组建贵州大学，使之成为综合性、研究型、教学型的大学。

2005 年 9 月 8 日，贵州大学正式进入国家“211 工程”建设行列。贵州的高校多集中于省会贵阳。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城市人口及招收生员的猛增，学校的基础设施日显陈旧、狭窄、稀缺，制约着高等教育的发展。2009 年，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决定启动贵阳花溪大学城建设项目，以解决省属高校在中心城区布局过挤问题。大学城为高校聚集区，占地 5 平方公里，于思丫河与斗篷山之间，距花溪行政中心 2.5 公里。2016 年 9 月已相继有贵州师范大学、贵州财经大学、贵州医科大学、贵阳中医学院、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贵州城市职业学院、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大学明德学院等入驻。^①

花溪公园发展的同时，花溪镇亦在日益拓展、繁荣。除场坝上原有的一条老街现改称为“花阁路”及一些老巷道外，新辟有青溪路、贵筑路、霞辉路、将军路、民主路、文化路、公园路、园亭路、葫芦路等 10 条街道，且全都是可通行机动车辆的水泥路面。道路两侧矮小的平房已撤除，多换为高大的钢筋水泥楼房。机关单位、书店、邮局、商店、餐馆等杂面大街小巷。白天店铺琳琅满目，夜间街道灯火辉煌。除有六层高楼的花溪医院外，还有花溪中医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街上的居民为 479 户，2300 人。1982 年已达 3 万人，2002 年则达 6.92 万人。因其环境优美、气候颇宜人，故来此定居的人数增加快速。

濮人是我国古老的民族族系之一，参加过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战国至西汉时期曾显赫一世的“夜郎”即其建立的部族联盟式的地方民族政权。唐蒙通夜郎，引发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战略决策，分别将“西南夷”纳入中央王朝版图，开发为南方丝绸之路的陆路通道。仡佬族即濮人流传于今之直系后裔，其人口分布于黔、桂、滇三省区，但是其主体基本上在贵州。明清时期依其服饰、习俗形成红仡佬、白仡佬、花仡佬、打牙仡佬、打铁仡佬、披袍仡佬等诸多支系。

其中，于贵阳府者为花仡佬及红仡佬二种。因其牛马集市闻名遐迩而著名，更因其邻寨寒士发迹后就地培植风景到刘建魂任县长时将其辟为公园，并采纳下属意见定为“花溪”。时值日寇大举侵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贵州成为抗战大后方及国际援华物资主要通道。1947 年，防空学校照测总队曾驻扎花仡佬大寨，并将南京市死难将士 300 余具遗骸迁葬其地，建有“抗日将士纪念馆”。国内文化名流经贵阳往返重庆，多顺便于近郊新辟具有田园风光、小巧秀丽的花溪公园览游后，皆留下清新、秀美的记忆。花溪大寨村 2014 年有 431 户，90%为布依族。村内有幼儿园、民族小学、平桥中学各一所。

1995 年即已达到小康村水平。20 世纪 90 年代，旅游业于全国蓬勃发展，区政府有关部门为进一步提高花溪的知名度，特花重金从外地请来专家给花溪的一些景点进行规划、重新命名。曾将花溪取名为“爱河”、黄金大道更名为“鸳鸯大道”等，均遭到人们普遍反对而作废。2014 年底，花溪区政府作出拆迁大寨村的决定，限期 50 天内拆完。据说，拆迁后的大寨村民分别安排迁往羊昌坝及罗平新城。明清时期的花仡佬大寨孕育出驰名遐迩的花仡佬牛马集贸市场，抗战时期又培植出独具田园风光的花溪，给国破家亡的诸多文化学者、抗战将士心灵的抚慰、爱国情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来此视察、留下诸多赞美的诗句。花溪大寨这个传统民族村落既养育着勤劳智慧的在此曾经繁衍生息的不同民族人民，又记录着它自明清以来独特悠久而秀丽的史迹。

参考文献:

[1]徐开心. 美国大兵在花溪——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见证[J]. 贵阳文史, 2017(5).

注释:

1 道光《贵阳府志》。

2(1) 见《贵阳市花溪区志》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3(1) 《名人与贵阳寻城迹》王尧礼《叶浅予的转折点》重庆出版社 2013 年 7 月版。

4(1) 见《贵阳市花溪区志》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7 年出版。

5(1) 杨大德：《我在公园工作时的公园情况》，《花溪区文史资料选辑》第七集，1990 年。

6(1) 徐开新《邓小平视察花溪农村工作》载《贵阳文史资料选萃》下册。

7(1) 《百年教育》政协委员关注促进花溪小学建设项目完成，郭秀。

8(1) 李涛《一座因学而盛的城贵州大学城职教城建设成就掠影》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